苏中抗日根据地——

从坚守到反攻的战略支点

■马金平 周 一

苏中抗日根据地，因其位于江苏省中部地区而得名。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、盐城以南，东濒黄海、西至京杭大运河，是一片海拔较低、起伏不大的平原地区。就其内部而言，因有串场河沟通南北、通杨运河横贯东西，又把这片地区分成北部的里下河平原、东部的滨海平原和南部的长江三角洲平原。这里水网稻田纵横，物产丰富，既是国民党政府在江苏的军事政治中心，又紧靠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的诸多后方重镇，斗争环境十分复杂。

1939年，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“向南巩固，向东作战，向北发展”的指示，抽调一部分兵力北渡长江，并控制了江北岸的江都、泰兴、泰县等地，建立了中共苏北工委，初步形成横跨长江两岸的布局态势。随后，国民党顽固派逐渐将反共摩擦的重点转移到华中地区。我根据地军民在党的统一领导下，先后取得郭村保卫战、黄桥保卫战的胜利，并与南下的八路军部队胜利会师，基本实现在这一地区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。皖南事变之后，中共中央指导新四军重建军部，并以苏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师，兼苏中军区，由粟裕担任师长兼军区司令员，苏中抗日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

苏中军区部队在进军途中。资料照片

敌进我进，确保基本区安全

苏中军区成立之后，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新的对日作战形势，对其提出任务转换的要求，即“将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农村”，作战形式则以反“扫荡”为主。1941年6月，根据地召开苏中地方武装建设工作会议，研判形势、部署任务，并对所属部队进行调整，建立起主力部队、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。同时，进一步确立游击战作战方针，决心以短小精干的力量开展“实际、准确、具体”的攻击行动，积小胜为大胜，用一切方法消耗和歼灭敌人。

这一时期，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挑战的时期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侵华日军企图把在中国的“占领区”变成其重要的后方基地，开始大肆掠夺物质资源，同时以交通线为依托，修建大量碉堡、据点，以弥补其兵力不足的弊端。在此情况下，苏中军区以若干基本区为防御要点，同时开展敌进我进的游击战，以打破敌人的分割和封锁。其中，以1941年下半年开始的五战丰利、七战三仓为典型代表。

丰利镇和三仓镇均位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东北部，由于靠近大海、敌伪势力较弱，常有军区机关和部队主力驻扎，是根据地内重要的基本区。从1941年6月开始，敌军就对这两个小镇展开频繁“扫荡”，到12月上旬攻势最为猛烈。12月8日清晨，日伪军兵分三路奔袭丰利，第1师首长在探明敌情之后，发现东南一路敌军因受水网阻隔、机动距离较远，与其他两路基本失去了协同策应的机会，随即决定集中兵力先打东南一路。就在这路敌军刚刚到达双灰山以北，准备组织休息时，第1师第3旅1个营和师部特务营突然发起攻击，一举击溃其伪军1个团，毙伤俘敌300余人。随后，师主力尾随另外两路敌军进入城镇，在城中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内外夹击，敌军大乱，只能释放毒气夺路而逃。第二天，敌军认为我军能够在丰利作战，三仓必然空虚，遂转兵向三仓袭来。第1师马上调集3个主力团，待敌人进入城中之后将其包围，激战1天后，迫使其撤回据点。经过多次反“扫荡”作战，虽然两个小镇受损严重，但仍在我军控制之下，确保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安全。

建立政权，贯彻一元化领导

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，是抗日根据地形成和巩固的重要标志之一。从1941年开始，苏中抗日根据地就开始了民主建政工作，但是受到敌、顽势力和游击战争客观环境的影响，很难进行自下而上的选举，因此，根据地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，自上而下进行政权建设。通常情况下，由各级党委向地方政府选派县长、区长，再由县区长提名政府主要成员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各级政府吸纳大量民主党派、进步人士、群众代表等进入政府机构，共同参政议政。

在组织建设上，自苏北区更名为苏中区之后，苏北区党委也更名为苏中区党委，并成立苏中行政公署，其职能地位相当于地区性的军政委员会。随着反“扫荡”斗争的不断深入，苏中抗日根据地亟须将党、政、军各方面工作统一起来，实施一元化领导。1942年底，为实现这一目标，各级军政委员会均被撤销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级党委，共同受苏中区党委领导，统筹全区范围内的党、政、军工作。

在苏中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，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，发挥了重要的战斗堡垒作用。在发展党员方面，他们不仅吸收农民、雇工和产业工人入党，还动员大量知识青年加入组织，不仅大幅增加了党员数量，还极大提高了党员质量。在思想建设方面，苏中区党委高度重视政策宣讲和学习教育工作，全区发行的党报、刊物有15种之多，其中《抗敌报》《苏中报》《党风》等报刊不仅是宝贵的学习教育资料，更搭建起重要的抗日宣传舆论阵地。在敌军工作方面，苏中区党委结合属地城镇较多的实际，建立多个秘密党组织和交通联络点，深入敌占城市从事地下工作，为党和军队获取大量宝贵情报，并为下一步开展反攻、接管城市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车桥战役，揭开大反攻序幕

1944年初，在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反“扫荡”之后，苏中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，新四军第1师和地方武装也得到锻炼，主力部队完全有能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。反观敌军，不仅其“分割”“封锁”的企图没能实现，其兵力也因被不断抽调捉襟见肘，我军实施局部反攻的时机逐渐显现。2月，苏中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，粟裕在会上提出攻打车桥的建议。拿下车桥，既可以打通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、扩大解放区，又可以锻炼部队、提振军民的抗战士气。

车桥位于淮安东南，是日伪军重点经营的一个据点。他们在此深沟高垒，修建碉堡数十座，形成了内外交叉的密集火力网。

鉴于车桥易守难攻的特点，粟裕等师首长指导部队精心准备。一是充分研究地形、敌情。早在1943年6月，粟裕前往黄花塘军部参加会议时，就有意设计了一条环绕车桥、淮宝地区的往返路线，随他一同前往的还有部分侦察人员。通过实地侦察，大家对车桥一带的地形已了如指掌。车桥刚好是日军驻扬州的第64师团和驻徐州的第65师团部署结合部，这两部平时的协同配合很差，一旦开战难以相互支援。为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优势，第1师将平时互相熟悉、作风相近的部队混合编组，共编成3个纵队和1个总预备队，在增强部队之间默契程度的同时，提高了重点方向上的战斗实力。同时，考虑到攻击车桥，附近驻淮安的日伪军必然会出动支援，粟裕专门抽调部分主力部队，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芦家滩一带，坚决阻止敌人援军通过。

1944年3月5日凌晨，第1师第7团兵分两路，趁夜暗直插车桥镇。这一行动大大出乎敌人预料。我突击部队仅用25分钟就全部冲到镇内，将日伪军各处碉堡分割包围，开始各个歼灭。天亮之后，驻守淮安的日伪军果然出动增援车桥，当他们行进到芦家滩附近时，遭到我军顽强阻击。战至黄昏，车桥伪军基本被全歼，日军也仅剩数人龟缩到少数几个据点负隅顽抗，战斗进入搜剿残敌阶段。至6日清晨，车桥战役胜利结束，我军共计歼灭日军465人、伪军483人。这场战役的胜利，打乱了日伪军“扩展清乡”“强化屯垦”的计划，打开了苏中西北局面，进一步加强了苏中、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，扩大了第1师的机动范围，震慑了淮宝地区日伪军所有据点。此战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。

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敌后抗战的典型代表，根据地军民在苏中区党委、苏中军区和新四军第1师的带领下，以机智勇敢的游击战挫败敌人的阴谋企图，巩固了根据地，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。抗战还未结束，粟裕就率领第1师主力南渡长江，执行发展苏浙皖边区的战略任务，为下一步实施全面反攻奠定基础。

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

大桥战役：

一仗打出两个『铁锤子团』

■胡遵远 杨晓璐 吴昊娅

1941年的淮南津浦路西地区，日军、伪军和国民党军盘根错节，相互勾连，祸害一方。新四军第2师作为该地区抗日救亡的一支重要力量，为粉碎日伪军“扫荡”和防御国民党军进攻，与敌人进行了频繁激烈的艰苦斗争，先后涌现出一批作风顽强、善打硬仗的英雄队伍。其中，1941年初冬的大桥战役，更是一仗打出两个威震江淮的“铁锤子团”，其战斗故事至今仍在当地群众中口耳相传。

一

1941年10月，驻淮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向津浦路西地区的新四军发起新一轮进攻。敌军一改以往长驱直入的打法，采取稳扎稳打的“滚筒”战术，一步一步向北“拱”，“拱”占一个地方就抢筑工事，第二批部队再依托既设阵地朝前“拱”。至11月上旬，国民党军第171师，第8、第10游击纵队等6个多团的兵力，先后侵占广兴集、周家岗、大桥等地。

面对敌军多路进攻的严峻形势，第2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决定进行自卫反击，集中4旅、5旅、6旅的6个团及5个县总队的优势兵力，首先夺回大桥这一江北战略要地，使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。

11月15日，第2师召开大桥作战会议。会上，为统一指挥大桥战斗，师首长决定成立野战司令部。在认真研究敌情后，野战司令部具体作战部署为：第4旅第11团强攻大桥镇，第6旅第16团在大桥以南新张家进行阻援，其他各部配合行动。各团都当场表示保证完成任务。

二

会后，作为攻坚部队的第4旅第11团立即回到驻地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传达任务，并组织干部秘密到现场侦察敌情、勘察地形。

当时，驻守大桥的是国民党军第511团1营和定远县常备大队，总兵力1100余人。敌营长韦刚狡诈残暴，自诩其部“从未打过败仗”。虽然我军在兵力上不占优势，但该地作为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，群众基础深厚，加之冬季河道干涸，河流构不成障碍。第11团经周密侦察后认为，只要战术得当，攻克大桥确有胜算，遂立即展开作战部署。

11月16日早上，第4旅政委王集成来到第11团作战前动员，提出要用第11团这把“铁锤子”，砸烂韦营的“乌龟壳”，并郑重宣布：“师首长有考虑，哪个团攻下大桥，就给他‘铁锤团’光荣称号！”本就士气高昂的第11团指战员听闻这番激励后，全体振臂高呼“保证完成任务”！

当晚，第11团悄悄出发，并于23时前包围了大桥。23时30分左右，第11团从3面同时发起攻击。战至后半夜，1营全歼小街西南之敌；2营也扫除了大街北侧多处据点，歼韦营1个多排；而3营进到大街西侧却未能打下顽军的地堡群，前进受阻。

直到此时，敌军才意识到新四军的实力不可小觑，当即组织反击，派出多支小队向1营发起冲锋。1营官兵依托小街北城墙顽强抗击，以密集火力大量杀伤敌军。战至拂晓，1营成功击退敌军多次反扑。随后，1营冒着炮火沿敌军撤退路线突入大街，继续向纵深推进。

由于国民党军凭借堑壕工事和密集火力点，一面进行顽抗，一面实施迂回反击，战至17日11时，第11团在南、西、北3个方向均未能取得突破，战局陷入僵持状态。

13时30分，经过动员和部署的第11团再次发起进攻。团突击队与1营1、3连，以原态势攻击前进；2营展开正面进攻，牵制和分散敌军力量；3营调整了战斗组织，其主力在火力掩护下，用排子手榴弹（1个排同时投弹）炸开敌军中心炮楼，消灭地堡群的敌人。

14时许，战场突起西南风。3营抓住战机点燃稻草实施火攻，大火迅速席卷全镇。国民党军阵脚大乱，仓皇逃窜。第11团各营果断展开穿插作战，对溃逃之敌实施围歼。至15时10分，自诩“从未打过败仗”的韦营，被我全部歼灭。

三

为阻援敌于外围、确保主攻部队行动，第2师在战前将第6旅第16团配置于大桥以南的新张家，伏击由广兴集、界牌集出援大桥之敌。第16团抵达指定位置后，团部和3营部署于新张家附近高岗上，1、2营隐蔽于高岗下开阔地带两侧。全团严格执行战场纪律，做好战前准备。

17日下午，国民党军第511团1个加强营向大桥方向开来。当敌军进入第16团伏击圈时，高亢雄壮的军号声响起，全团指战员跃出工事，从3个方向扑向敌军。

经过几番冲杀，敌军被歼半数以上。残余敌军见形势不利，在其营长指挥下窜入新张家村，利用村庄民房紧急构筑工事。第16团迅速调整部署，以第2、第3营担任警戒，第1营围歼新张家之敌。战至当夜，村内残敌大部被歼，敌营长率领少数人员依仗重机枪固守一处民宅，继续顽抗。团首长将攻克敌最后据点的任务交给1营2连。2连受领任务后，经讨论决定实施火攻，但连续3次引火均未成功。紧急时刻，文书小陈主动请战。他身披两床湿棉被，在机枪掩护下，急冲到敌军占领的屋前，迅速点燃房檐草。火势开始向四周蔓延，而小陈在撤回过程中不幸中弹牺牲。随后，2连指战员将手榴弹投向燃烧着的屋顶，并向敌军展开政治攻势。残敌见大势已去，在火光中逃出盘踞的房屋，向我军缴械投降。

大桥战役中，新四军第2师第4旅第11团和第6旅第16团共歼灭国民党军2个营，重创进犯路西地区的国民党军，迫使其全线撤退。此役不仅稳定了淮南局势，巩固了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，更极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反摩擦斗争的信心。

战后，为表彰参战部队，第2师授予负责打援任务的第6旅第16团“铁锤子团”荣誉称号，颁发“铁锤子团”奖旗一面；第4旅授予担负攻坚任务的第11团“铁锤子”荣誉称号，颁发“铁锤子”奖旗一面。虽然二者的荣誉称号存在细微差别，但两支部队均被军民亲切地称为“铁锤子团”。

左图：新四军第4旅第11团获得的“铁锤子”奖旗。 资料照片

下图：新四军第6旅第16团获得的“铁锤子团”奖旗。 资料照片

战车万乘驱狼烟

——中国古代战车（上篇）

■曹 波

殷墟博物馆中展出的商朝单辕双轮战车模型。资料照片

在中国古代，车作为重要的运载工具，在军事与生活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其中，用于军事作战的车辆被称为战车，即专门承载士兵进行车战和野战的车辆。这种车马结合的方式，使古代军队能够有效驾驭马匹，大幅提高行军速度、后勤补给能力及作战冲击力。尤其在大规模骑兵尚未出现时，战车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，成为战争中的核心力量。

关于使用战车的记载，最早见于《尚书·甘誓》中夏王启讨伐有扈氏的甘之战。虽然夏朝战车实物未能保存，但《尚书·甘誓》记载了车上士兵有3人，且都有明确分工，这种形式延续至商周。此后，战车在军队中逐渐普及，车战也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。

至商朝时期，战车制造工艺显著提升，车体局部开始采用青铜部件（称为“车器”），主要起到加固和装饰的作用。商朝战车在春秋战国的《考工记》中有明确记载，且殷墟出土的战车是中国考古发现的首辆实物战车。这一时期，是整个车战时代战车的定型期，此后的战车形制结构均与商朝战车保持一致。商朝战车整体采用木质结构，青铜部件仅用于重要部位，主体由轮、舆、辕、衡、轭5部分组成。战车设有双轮，且轮径较大，约为130至140厘米。每个车轮通过多根辐条将轮圈固定于被称为轮毂的中心圆木上。舆即车身，一般呈长方形，尺寸为宽度130至160厘米，进深80至100厘米，采用后开门设计。车身上通常安有被称为轼的扶手。辕又称軥，是车身的龙骨，其軥头往往是装饰重点，用来凸显车主的身份地位。衡和轭是控制马匹的部件，二者与辕连接，共同构成用于驾驭马匹的挂套系统。由于战车轮径大、车厢宽而进深短，而且又是单辕，使得车体稳定性面临挑战。为此，商朝战车车毂长度远超普通马车，这样的设计也可防止敌车逼近车厢两侧。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，战车在商朝军事体系中地位显赫，与甲、弓等并列为重要的作战装备。此外，文献中“王车”与“小臣车”的区分，更反映出战车已成为身份象征。

商朝至春秋战国时期，战车的制造工艺不断精进，但单辕双轮方舆的基本形制始终保持，成为中国古代战车的典型特征。此外，商朝战车的单车配置，也为后世战车运用提供了重要参考。在战车单车配置上，一般每辆战车配有3名士兵，按左、中、右次序排列，分别称为车左、御者和车右。其中，车左又名“甲首”，为一车之首，持弓主射；御者居中，负责驾驭战车，只随身佩带短兵器；车右又名“参乘”或“戎右”，执长柄戈或矛主击刺，并为战车排除障碍。1辆战车一般由2匹或4匹马牵引。当使用4匹驾马时，中间2匹称为“两服”，左右2匹称为“两骖”。战车上的士兵除随身佩持的兵器外，车上还备有若干有柄格斗兵器。据《考工记》记载，这些兵器包括戈、殳、戟、酋矛和夷矛，合称“车之五兵”。

商灭夏的鸣条之战，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运用战车的战役。公元前约1600年，商汤趁夏王朝主力分散于外、国都空虚之际，正式兴兵讨伐夏桀。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商汤投入70辆战车和6000余名死士，战车集群采用“雁形阵”，冲锋配合步兵跟进。夏军慑于商军疾驰的战车和死士视死如归的气势，很多士兵阵前倒戈，商汤一举击溃夏军。此战展示的战车集群和步兵协同的战术创新，对后世车战的发展影响深远。

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发行电话：（010）68525572 每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出版 全年定价150元 零售每份0.57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（地址同社址）